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人与商会史研究综论^{*}

覃婷婷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发展迅速,学术界围绕着商人与商会研究的主要层面、商人与商会的总体与个案分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

[关键词]近二十年;近代;商人与商会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4-0135-04

综观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发展的百年历程,可以说成果斐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近二十年中,仅关于近代商人研究的著作就有16部,发表的相关论文即达170余篇,近代商会史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涉及此研究领域的各个层面。代表作有: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等。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等。相关论文有:朱英《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近代中国商团研究述评》(《近代史学刊》2001年12月第1辑)等;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皮明麻《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温小鸿《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黄逸平《近代

宁波帮与上海经济》(《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等等。

商人,是近代中国命运起伏颇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晚清的重商主义浪潮让一直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大为提升。但1949年后,私营工商业的取缔使商人这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被冷藏。改革开放以后,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又日趋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以下笔者试就近二十年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概述。

1. 近代商人与商会研究的主要层面

商人群体是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再到商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中商会是论述的焦点,分别有四部专著问世: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马敏、朱英著《传统和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徐、钱二位之合著以时间为序,对上海商会之发轫及组织演变、其于清末民初的经济活动、与本世纪初30年中国政治变迁之关系等均有较详叙

* [收稿日期]2007-06-10

[作者简介]覃婷婷(1983-),女,湖南邵阳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述;马、朱之合著则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苏州商会之创设、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及性质等七个方面的问题;虞著为通论性的商会研究专著,他把商会置于中国早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论点;朱英新著以商会为研究主体,阐释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除了上述专著外,讨论商会的论文还有多篇,如胡光明对清末及北洋时期天津商会之研究、屠雪华对苏州商务总会性质的分析、梁洪生对江西吴城镇商会历史的发掘等均颇具功力。^[1]

论及商会研究,不可避免涉及商团。商团是商会的一支武装力量,与商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商团的性质,沈渭滨、杨立强以上海为例,指出商团是商业资产阶级政治武装团体,它既维护商业资产阶级行帮利益,又协助清政府维护统治秩序,具有行帮武装和政治武装的色彩。^[2]皮明庠分析了武汉的情况,认为商团是一种半武装性的组织,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但武汉三镇的商团情况不尽相同,汉口商团具有纯商、纯民性质,武昌、武汉的商团则是绅商合办。^[3]冯天瑜等人认为,武汉商团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要求,但对此没有展开具体论述。^[4]由上可知,不同地区商团的探讨,需要具体分析。关于商团的组织情况,沈渭滨、杨立强认为,上海商团的成员很复杂,其内部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也是不一致的。皮明庠指出,武汉的商团具有相当的群众性,不仅有中、小商家参加,而且充任团员的主要是店员、工人和城市居民。

商帮研究主要集中于徽帮、晋帮及宁波帮。专著主要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1年10月)及张海鹏与王廷元合编《徽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张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宁波帮迄今尚无通论性专著问世,但有论文集为数不少。^[5]其他如苏州洞庭帮、江右商(江西帮)等虽不及徽帮、晋帮,亦曾有论文发表。^[6]

近代行会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仅见数篇论文。^[7]学者们主要从行会的近代化、商会与行会的联系与区别两个角度来加以论述。如张亦工的《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考察了商民协会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下成立最终又被其解散的短暂经过,认为商民协会主要是国民党试图控制资本家阶级的一个临时性“党化”工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团。

2. 近代商人研究

(1)商人与政治。学者们最初是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商人的,因此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近二十年来,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第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张亦工、徐思彦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处于政治启蒙时期,但政治能力感、党派意识与政治社团、领袖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未获成熟的政治发展。^[8]马敏认为近代绅商日渐明显的政治参与意识源于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经济斗争。^[9]虞和平、朱英指出,只有在商会产生之后,商人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才成为可能。^[10]

第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研究者们讨论得较多的是商人与1912—1916年袁世凯政府以及1927—1937年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1913年商人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与其政治代表相脱离的“政治大滑坡”。^[11]至于其原因,徐鼎新指出:商人对象政权支持与否,“是以这个政权是否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

第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商人们在1860年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一个高峰,但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甚而有组织“商人政府”之企图。但不久又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支持国民党反共,建立新政权。这并未给他们自身带来稳定的秩序和优惠的工商政策,反而使其最终丧失“政治自主性”。^[12]

(2)商人与经济及社会变迁。关于商人与经济及社会问题,丁日初等人指出应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作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马敏根据他对绅商阶级的考察,认为其经济活动既有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使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变得迟缓的一面。同时,学者们还注意到商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13]虞和平、张海林等人即指出在民国初年,商人的地位大为上升,其标志便是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及其功能的强化。^[14]

(3)商人与“商人文化”。近年来,“商人文化”一词经常出现在相关著作中。其含义界定似乎并不明确,唐力行曾这样表述:商人文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萌芽同质的,它跃动着早

期启蒙的曙光,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先导。^[15]

3、近代商会研究

关于近代商会,国内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肯定其资产阶级属性,认为它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团体。章开沅认为:“1904年后各地商会的建立,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至此资产阶级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16]马敏、朱英依据清末苏州商会的档案资料,也认为“商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的重要社会团体”,但是“和封建势力关系比较密切的商业资产阶级占据显要地位”。同时,还有许多论者指出,近代中国商会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但仍带有某些封建色彩。

另有学者如虞和平则认为商会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其社团性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工商界联合起来在共振实业的思想认同下自愿组成;二是它一般只准在本地经营的工商业者入会;三是有比较完整的组织协调体系,设置了各种专门办事机构;四是有固定的社会整合工具,以使当地工商界的各子系统与其整体组织保持一致。至于商会在实际活动中受政府强权控制的一方面,则是由近代中国法制和民主制度不健全所致,并非商会本身特性的表现。^[17]

至80年代国内商会研究已形成了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四个研究中心,分别以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研究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省市的商会也逐渐成为考察对象,如四川商会、杭州商会、贵阳商会、无锡商会,一些县级小城镇商会的研究也开始出现,顾林研究了高阳商会,其他的研究还有吴城商会、汕头商会等。与之相适应的是商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备受学者关注。汤可可、蒋伟新通过考察无锡商会的成员构成,认为无锡商会中工商资本家占了相当比重,他们对近代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8]席萍安认为,20世纪最初十年里,四川商会组织成员将资金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近代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此间,海外华商会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袁丁研究了泰国华商会,刘宏研究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商会。^[20]

二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商人与商会研究成就突

出。但全面仔细地观察,却发现数量颇多的成果中,也有不少泛泛而论者,甚至夹杂着低水平的重复制作。在研究格局、视角、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1、格局分布不太合理。时间视线多集中于晚清,在170余篇论文中,属于这个区间的占70%强,而关于1912年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商人与商会的文章不到20%。空间上多集中于苏州、上海、天津、广东、武汉等几个特定区域。当涉及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时期,就仅限于天津、上海等地。这种现象固然与资料利用有关,但仅依靠一、二城市的观察,视野未免狭隘。

2、微观考察过于欠缺。研究商人必不能离开对一个单独的人的微观考察,但学者们似乎擅长于从宏观上去把握,于商人个案分析甚弱。商人社团研究除了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外,其余地区亦有待加强,研究触角也宜深入到更小的商人群体。

3、研究视野应予拓宽。从现有研究的成果来看,考察地区性商会的为数不少,而从整体上对商会通史进行综合论述的成果却难得一见。对商会进行专题性、区域性研究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仅仅对几个地区的商会进行考察,而不对全国商会进行综合与整体性的分析,难免以偏概全。

4、理论与方法模式化。在放宽研究视野、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容易步入另一个误区,即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与概念来硬套中国历史,忽视以扎实的史料来做实证工作,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式到模式,使原本活生生的历史成为术语与辞藻的堆砌。

5、研究内容也应拓展。不仅要继续研究商人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更应重视对商会的经济活动、法制建设与民间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探讨,还可以深入调查当代商人与商会的组织发展和社会功能,并与近代商人与商会进行比较研究。

以上是笔者对近20年来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成果的简单概括和总结。文中提到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中国商人与商会史研究成果的精华,它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和争议。但我们相信这些争论会极大推动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的深入,使之获得更有意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光明.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J].近代史

- 研究,1989,(3);屠雪华.论清末苏州商务总会的性质[J].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2);梁洪生.吴城镇及其早期商会[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
- [2]沈渭滨,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J].历史研究,1980,(3).
- [3]皮明麻.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J].历史研究,1982,(2).
- [4]冯天瑜.辛亥革命中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J].江汉论坛,1981,(3).
- [5]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与发展[J].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3);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J].学术月刊,1994,(5).
- [6]范金民.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J].史学月刊,1996,(2);马学强.一个传统商帮的近代变迁——苏州洞庭帮在上海[J].史林,1995,(3).
- [7]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J].历史研究,1991,(5);唐明峰.清代行会的性质和作用[J].史学月刊,1988(4);孔祥毅.晋商行会:自治自来自卫的商人机构[J].文史研究,1994.
- [8]张亦工、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2(2).
- [9]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
- [10]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还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
- [11]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3,391—446.
- [12]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J].近代史研究,1990,(5).
- [13]张海滨.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J].江海学刊,1996,(4).
- [14]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论1920年上海总商会改组[J].近代史研究,1991,(4).
- [15]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简介)[J].近代史研究,1984,(4).
- [16]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J].近代史研究,1983,(1).
- [17]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J].历史研究,1990,(5).
- [18]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J].江淮学刊,1999,(2).
- [19]席祥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1).
- [20]袁丁.清政府与泰国中华总商会[J].东南亚,2000,(2);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J].历史研究,2000,(1);陈来李.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4).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recent twenty years

QIN Ting-t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research into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rapidly develops, and academic circle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about the main researches on businessmen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general and individual analysis of businessmen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research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 research achievement and shortcomings, and so on. This paper objectively expounds the current research achievement and research level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lessons for modern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research.

Keywords: recent twenty years; modern times; businessmen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